

古籍保护

专刊

藏书报

2019年10月14日

总第71期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万修远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中华传统文化
典籍保护
传承大展
专题

“传承大展”全面解读

□采访：王雪霞 受访嘉宾：张志清

自2019年9月7日“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正式拉开帷幕以来，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媒体争相报道，社会公众热情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更是因此成为国庆期间的热门打卡“景点”。

大展汇集了40余家公藏单位及30余位民间藏书家的330余种珍贵藏品，仅珍贵宋版书就有近百部，这样规模大、品位高，琳琅满目、内涵丰富的展览，到底好在哪里？该怎么欣赏？本期，我们特别邀请此次展览的主创、策划设计者之一，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先生进行深入解读。

谈初衷：

综合反映珍贵藏品和保护传承成果，创新性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

张志清：筹备此次大展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等古籍收藏单位，陆陆续续举办了大量古籍展览，但在规模及展品的珍贵性，以及所能起到的社会影响方面尚显不足，尤其是能综合反映珍贵藏品和保护传承成果的大型展览还有欠缺。文化和旅游部等上级单位都给我们提出了要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更有办法。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以此为契机来

举办“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就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从目前的反响看，初步达到了我们所预想的效果。作为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系列专题活动之一，“传承大展”一经发布，就在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员来到了展览现场，一致认为此次展览举办得非常好，既展示出了珍稀文献典籍，也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业界外，普通读者的反映也非常热烈，到国图来观展的人络绎不绝，节假日的人流量更大。各省也纷纷组织开展传统文化活动的有关人员、古籍馆员们集体到国图来参观，其他相关部门如国家发改委的人员也都慕名而来，反映都不错。

对大多数人来说，古籍理解起来并

不容易，因此，我们预想的是活动会随着不断地讲解、宣传越来越好，但没有

想到一开始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确实感到非常惊喜。



晒亮点：

规模大、质量高、参与范围广；突出“利用”；重视揭示藏品内涵

张志清：此次大展和以往的展览有些不同。

首先是规模比较大且展品丰富。从规模上说，除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那次前后九个展厅都用来展出珍贵馆藏之外，此次展览是最大的；而从参与的广泛性及展品的丰富性上说，此次大展的优势还要更突出。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时举办的展览，展品基本上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珍品为主，此次大展则汇集了40余家公藏单位及30余位民间藏书家的330余种珍贵藏品，范围之广、参与度之高、展品之丰富与珍贵都是历来

前所未有的。我们最初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汇集全国最好的部分展品，与国图的珍贵藏品相得益彰，共同面向公众展出，以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次是突出“利用”。中央主张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要怎样创造性或创新性举办展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课题。此次展览就把重点放在了“利用”上。比如中宣部支持指导、文化部委托国家图书馆启动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同时邀请了全国的古籍大家参与编撰，请袁行霈先生担任主编。这个编纂项目的启动就是要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最关键，同时作为文脉传承的典籍，为了配合这项工作，此

次展览的第一展厅展出的110件珍贵藏品和“百部经典”直接呼应，是年代最早、最完整的，同时也是现存某一部经典的最好版本，通过这110部经典体现出文脉担当。因为中华传统典籍是我们的根与魂，是民族记忆和精神家园，这一点在第一展厅有充分体现。从目前读者的反馈来看，对第一展厅的陈列非常满意。

再次，展览内涵丰富。第一是从思想角度揭示了这些经典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位置，即其在整个传承体系中的位置。第二是从书籍本身的珍贵性上来介绍，把在文化传承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展品展出，并揭示其意义。比如中国历来有尊崇陶渊明的文化传统，最关键的两部陶集在历史流传中是脍炙人口的，黄丕烈曾收藏这两部陶集，

后周叔弢先生也曾收藏，现在我们把两部陶集共同展出。类似的还有双鉴楼的“双鉴”，宝礼堂的《礼记》，被认为传世最好的宋版韩（韩愈）柳（柳宗元）集，能体现中国赏梅文化的“双梅”——《梅花百咏》和《梅花字字香》等，小说中的四大名著和戏曲中的珍贵部分也有展出。第三是介绍古籍知识。书籍展览不能翻出很多页供读者阅读，所以在介绍古籍知识的时候采用了“听”的方式，即在古籍旁边放置一个二维码，用微信扫描后就能在手机上听和看，从而达到深入了解古籍知识的效果，把思想、文化和知识性结合在一起。虽然还不能把古籍的“前世今生”都讲明白，但较之过去，传承渠道更宽广、展示方式更进步了。

揭内幕：

从国家宝藏到民间珍藏，再到中外的交流互鉴，最后到整个古籍保护的成果，内部都是有一个联系点的

张志清：此次大展共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国宝吉光是和“百部经典”直接呼应的，之前已经提到过。第二展厅展出的是民间收藏古籍，包括30余位藏家的70多部古籍，这应该是目前民间收藏参与公藏展览展出数量最多的一

次。通过展览，反映出公私双方对文脉的传承，体现了我们充分认识到社会力量、社会资金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此次我们邀请了很多收藏家参加开幕式，之后举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很多收藏家心情非常激动。收藏家谱的励双杰先生在开展前一天给我发信息表示，原本以为这是给民间单独办的收藏展，没想到会是规模这样大，且是跟国家珍宝共同展出，这让他心情特别激动，更加觉得自己以一己之力搞家

谱收藏是非常值得的。其他藏家在座谈会上也谈到，自己的收藏能够得到国家的重视，参与到大展中，让他们觉得非常荣耀。这种方式直接拉近了公藏和私藏的距离，对于以后公藏私藏共同来传承中华文脉、在社会上发挥古籍保护的作用、增加彼此信任感等各个方面，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第三展厅是交流互鉴。历史上中西文化的交流，第一次在此次展览中得到系统的展示。从展出的典籍中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向国外学习，比如佛教传入之后，玄奘等人到天竺取经就是主动向国外学习，这也使得儒释道三者结合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再如明末以来西方文化传到中国后，是怎样一代一代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这些在此次展览中都得到了展示。展厅里内容丰富，涉及植物、药物、造纸以及外国人画的画等，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介绍，也看到了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

（下转第12版）

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正在国家图书馆展出。展览共分国宝吉光、百代芸香、汲古润金、交流互鉴四个展厅，汇集了全国20多个省40余家公藏单位、30余位私人藏书家的珍贵藏品330余种，展现了历朝历代在哲学、思想、科技、文学等各个方面的成就。为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记忆传递给每一位观众，特摘选其中数种，讲述典籍背后故事，供读者了解，并更深入地走近“国宝”，欣赏大展。

“国宝吉光”背后的故事

《孝经》：“五好标准”的代表

《孝经》以“孝”为中心，集中阐发儒家伦理思想。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孝经》者达几百家；唐代更被尊为经书，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注解，陆德明为其注音。长期以来《孝经》被看作“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孝经》为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为天禄琳琅旧物。《天禄琳琅书目》及《四库全书总目》均认为相台岳氏群经为南宋时岳飞之孙岳珂所刻。后学者考订，相台本群经乃元初义兴（今江苏宜兴）岳浚据宋末廖莹中世綵堂校刻九经本校正重刻，岳浚是岳飞的九世孙，因岳飞是相州汤阴人，故称相台岳氏。

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所刻群经，以版印精美闻名。此本原为明代晋府旧藏，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入清递经季振宜、徐乾学收藏，后归内府天禄琳琅。书中钤有“太上皇帝之宝”“八征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宝”“乾隆御览之宝”等皇家印玺。

此书后为周叔弢收藏，周氏藏书以富而精享誉海内。周叔弢曾总结善本的“五好标准”云：“版刻好，好比一个人



(唐)玄宗李隆基注，陆德明音义，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先天体格强健；纸张好，印刷好，好比后天营养好；题跋好，好比此人富有才华；收藏印章好，好比美人淡妆，幽幽素雅；装潢好，好比衣冠整齐。”此《孝经》堪为符合五条标准的代表书籍。周叔弢收得《孝经》后异常兴奋，专门治“孝经一卷人家”印，以示珍爱。

周叔弢先生收得《孝经》后，上海涵芬楼曾借以影印。不久，涵芬楼又以佳纸影印《孝经》二十部，酬赠周先生。周先生本人也曾以珂罗版彩印，比原本略大，书中原有收藏印都用红色套印，非常逼真后又付工影刻。影刻本笔致神韵，直逼原本。孤本秘笈在周先生手中不仅安全传承，而且化身千百，流传世间。

《楚辞集注》：海内孤本，推动邦交



(宋)朱熹撰，宋端平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灿烂篇章，它与《诗经》一起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风骚传统。朱熹的《楚辞集注》是众多《楚辞》注本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为后人治骚所必读。楚辞本是战国时期楚地歌谣的泛称。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将楚歌楚语加工成为文人的创作，后世又有不少模仿之作。西汉末年刘向校理群书时，辑录战国时期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的拟作，通称为“楚辞”。

在南宋大儒朱熹注释《楚辞》之前，已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两部重要注本。朱熹注释典籍往往在汇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见，注《楚辞》亦如此。朱熹的《楚辞集注》重新编排了《楚辞》的篇目，在注释方法上也与前注不同。其卷一至卷五收屈原作品，总其名为“离骚”；卷六至卷八收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的作品，称为“续离骚”。区分屈原作品和其他人的拟作，明确突出了屈原在楚辞创作中的中心地位。在注释方法上，朱熹特别强调调通章句，阐发义理。王逸和洪兴祖的注释皆以名物训诂为主，朱熹以为二人未能阐发大义，遂以四句为一章（亦有六句、八句不等），先释字义再通释章句，每章又加以揣摩，系以赋、比、兴字样。由于这种贯通的理解和对作者意旨的尊重，朱熹对屈原有更多正面的评价。

国家图书馆藏宋端平二年（1235）朱熹孙朱鉴刊本《楚辞集注》，为海内孤本，是目前宋本中年代较早且最完整的一部。书后另附有《楚辞辨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前者考订旧注，后者辑录宋玉以后至宋吕大临的拟骚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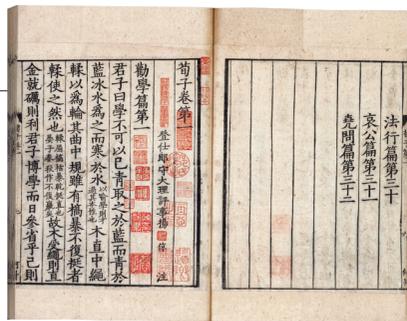
这一部书在中日外交关系史上还有一段佳话。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双方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进行着艰苦的谈判。在即将达成协议9月27日，毛泽东与田中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并将《楚辞集注》作为礼品赠送日方。会面后的第三天，两国即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有很高的造诣，他曾专门收集《楚辞》的各种版本及屈原著作50余种，其送给田中角荣的就是国图藏北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的影印本，推动了中日友好交流。

《荀子》：价值万金，流传有绪

《荀子》为战国时荀况的文集。荀子，名况，字卿，生卒年不详，战国末期赵人。荀子继承儒家学说，并有所发展，为先秦时期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他主张须由圣人制定礼义，进行教化，才能使人转而为善，社会更加安定。在政治上隆礼重法，在君民关系上重视民本，在天人关系方面，荀子认为应顺应自然规律，荀子还主张以名证实。这些观点在《荀子》一书中都有表述。

这部宋刻宋印《荀子》，字大如钱，墨如点漆，刊印精美。原有著录为北宋监本，经考证，应是刻于南宋时期。书中钤有“孙朝肃印”“土礼居”“汪士钟藏”“韩应陞鉴藏宋元名钞名校各善本于读有用书斋印记”等藏书印鉴，曾为藏书名家孙朝肃、黄丕烈、汪士钟、韩应陞等人珍藏。

此书后由陈清华以万金购得。陈清华（1894—1978）号澄中，湖南祁阳人，曾留美，回国后从事金融业，20世纪30年代后，开始收藏中国古籍善本，先后获韩氏读有用书斋、袁氏后百宋一廬、瞿氏铁琴铜剑楼、傅氏双鉴楼等旧藏



(唐)杨倞注，宋刻本，顾广圻跋，国家图书馆藏

秘籍，藏书数量迅速增长，宋元善本、明清钞校稿本、罕见善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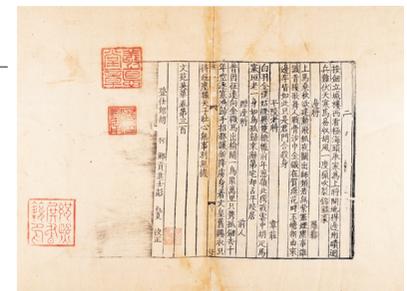
逾五百部，普通善本古籍不计其数。其藏书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于江南无有匹敌者，与天津周叔弢并称“南陈北周”，成为民国间两大藏书家之一。陈清华携《荀子》拜见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傅先生笑称：“君非以万金得熙宁《荀子》者乎？是可以‘荀’名其斋矣”，由此陈氏藏书室以“郇斋”命名。陈清华后来移居香港，1965年，有意出售所藏善本，其中即包括此《荀子》。周恩来总理为避免这批珍贵文物外流，责成文化部指派专人前去洽办，在国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斥巨资购回。此批善本现妥善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文苑英华》：千卷巨帙，存世寥寥

被称为宋四大书之一的《文苑英华》，成书于宋雍熙三年（986），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奉敕编纂。全书一千卷，收文上起自南朝梁末，下迄唐末五代，以唐代作品为多。全书录作家2200人的约两万篇作品，因选材、体例与《昭明文选》相类，时间与《文选》相衔接，可视为《昭明文选》的续作。编修时讹误较多，体例亦嫌驳杂，后又几经勘校。南宋宁宗庆元初年，周必大致仕，退居林下，组织校勘《文苑英华》，并亲自主持完成刊刻。

《文苑英华》成书之时，雕版印刷初兴，此书将柳宗元、白居易、权德舆、李商隐等人诗文全卷收入，成为后人赏鉴、辑佚、校勘、考订之依据。《文苑英华》所辑文献丰富，《四库全书》《全唐诗》《全唐文》《全六朝文》等书之相关部分诗文，多取自此书。书中所收诏诰、书判、表疏诸篇，亦可订载籍之是非、补史传之阙漏。此书可谓著作之渊海，史料之府库。

周必大所刻《文苑英华》是此书第一个刻本，也是宋代唯一的刻本。此本开本宏朗，刻成后进呈内府，内府用黄绫装封，皮藏于南宋皇家藏书楼缉熙殿。千卷巨帙，每十卷装为一册，共计百册。刻成56年后，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内府包胥臣曾检查书品，在未发现问题的书册上钤有木记。据国家图书馆现存的十三册看，木记内容为“景定元年十月



(宋)李昉等辑，宋嘉泰元年至四年周必大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初六日装裱臣王润照管讫”（各处时间略有不同）。宋版书记装裱人姓名，仅此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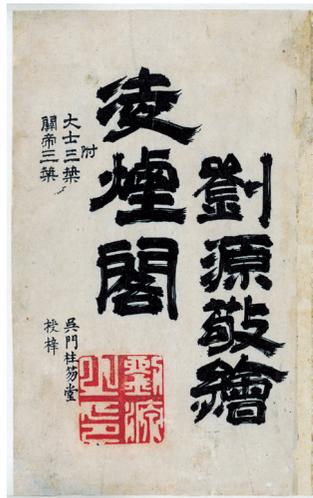
《文苑英华》原为千卷，然存世寥寥。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共一百三十卷十三册，其中的十册为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接收内閣大库拨交，三册为藏书家周叔弢、傅增湘先生或捐赠或转让而来。台湾“中央研究院”尚有宋版《文苑英华》十卷一册。1995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出现这部书的另外一册，然最终并未回归故园，令人深以为憾。宋版《文苑英华》存世数量至此可知为一百五十卷十五册。千卷巨帙，今仅此而已。

国家图书馆藏本保留了宋代的蝴蝶装原有装帧形式。均钤有“缉熙殿藏书印”“内殿文玺”“御府图书”三枚南宋皇宫藏书的印章。明代此书曾是文渊阁插架之物，后经晋藩收藏，有“晋府图书之印”“敬德堂章”等印。入清后书归内閣大库。

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展品最为丰富的综合性典籍大展，30余位民间藏家拿出自己的珍藏秘籍共76件，与公藏首次共同展出，这展现了中华文脉传承完整的藏书体系，体现出更多的互动性。今特邀请藏家对藏品背后的故事进行深入挖掘，以飨读者。通过这些介绍，引窥民间藏书文脉的传承，并了解民间藏书家在保存保护善本古籍、延续中华文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凌烟阁功臣图》： 两位艺术大师的双剑合璧之作

□拾伍猫庐



余好古书，借郑振铎先生话：“素志恬淡，于人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又好猫，无龙血凤髓之求，书斋所养，皆流离转徙之狸奴。

此次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余亦将所藏《增广大全司牧马经》《笠翁批阅三国志演义》《凌烟阁功臣图》三种赴国图展览，今特就《凌烟阁功臣图》进行介绍，以期挖掘其背后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观展者。

梳理源流： 记载颇多而实物无存

此《凌烟阁功臣图》不分卷，清康熙七年（1668）吴门柱笏堂刻本，开化纸本，红木嵌博古纹织锦书衣，上贴深黄色腊笺纸题签，册页装一册，拾伍猫庐藏。

开卷首见牌记，题：“刘源敬绘凌烟阁”，记：“附大士三叶、关帝三尊”，落款“吴门柱笏堂授梓”，钤“刘源之印”。卷前有康熙七年（1668）三韩彭彭年（配竹筒行格）、康熙八年（1669）亦梦居士晋安萧震序文；云间沈白（字贵园）题辞、袁钊（字三衡）题序；以云水纹为边框，附康熙七年刘源自序、吴门朱圭敬题记；目录叶以仿古瓷冰裂纹为背，列二十四功臣官职人物名称及附大士、关帝三尊。正文每半叶一幅功臣图像，人像正面题功臣官职、人名与略传，凡二十四；另半叶“诗集之工部，字仿之诸家”，每副诗词题赞周边配秦砖汉瓦、斧钺钩

叉、钟磬鼎彝，书砚琴瑟……种种纹饰可谓极尽工致，与人物图像交相辉映，将文、史、图、赞融为一体，令人目不暇给。又“以大士之慈悲，帝君之忠烈，冠子简端，聊以纪风云之盛，立仁义之极”，将《大士像》三幅、《关帝像》三幅附于卷末。

关于凌烟阁，史料记载颇多，如《大唐新语·褒锡》记：“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图画太原倡义及秦府功臣赵公长孙无忌、河间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郑公魏徵、梁公房玄龄、中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郑公张亮、陈公侯君集、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世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勋、胡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画。”

唐太宗为了纪念与他一同打拼天下的功臣，亦出于维护唐王朝政治团结的需要，修建凌烟阁以陈列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即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以示尊皇，并时常前往缅怀。原图像为真人大小，面北而立，计十二位文臣、十二位武将。后毁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的黄巢之乱，所以这《功臣图》并没有任何图像留存下来。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和灭亡，英雄们的事迹与形象散落于史学家或诗人的文章诗作之中，鲜有提及。

精彩再现： 双剑合璧共同绘制经典

直到清康熙七年（1668），豫人刘源从先民遗存文翰中，心领神会，并受前辈陈洪绶《水滸叶子》之“精笔墨妙”的艺术感染，有感而发，历时三载；又交付吴门版画奇才朱圭劂，这两位艺术大师双剑合璧，共同绘刻出这部大雅不群的《凌烟阁功臣图》。

刘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康熙年间，官刑部主事，供奉内廷。少工画，曾绘《唐凌烟阁功臣像》，镌刻行世，吴伟业赠诗纪之。及在内廷，于殿壁画竹，风枝雨叶，极生动之致，为时所称。可惜其传世画作极少，只有康熙八年（1669）《墨竹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康熙十五年（1676）《芝竹石榴图》，现藏常熟博物馆。以往版画界对于刘源的关注多在于其擅山水、人物、写意花鸟、书工行

篆等方面，今考康熙年间刘廷玑所著《在园杂志》卷四中记：“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规模，造作精巧，多出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监制焉。”这里明确指出，康熙早期官窑成就就显著，当时掌管官窑的名更有臧应选、郎廷极和刘源，造就了名驰世界的康熙御窑瓷器。《清史稿》载：“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

以刘源居其首功，可见他对于瓷器有着精湛的艺术造诣，并且具备很高的欣赏与鉴定能力。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凌烟阁功臣图》目录中会出现仿古瓷冰裂纹的样式了。此“冰裂纹”开片大小自然，裂片层叠、错落有致，其间隙细如发丝，刻画生动形象，极富立体感。古有“哥窑品格，纹取冰裂为上”的美誉，此种技术至宋代已经失传，正如历史上凌烟阁内这二十四功臣图一样，没有任何图像留存下来，而真正瓷器中的冰裂纹会随着时间与环境变化不停开裂，将各位功臣大名列于“冰裂纹”之上，相信作者还有更深的意味吧……

朱圭，字上如，吴郡（今江苏苏州）专诸巷人，世代儒门，出生时家道中落，以木刻为生。他是这个时代的奇才，对木刻艺术有着非凡的技艺与执着，人评“能达作者之神旨，笔笔生动；而银钩铁画，尤能大雅不群，实非常人可及”。因作此《凌烟阁功臣图》而名震天下，时年仅二十八岁；后应诏入官，成为御殿刻工，以刻技供奉内廷而得到清职，这在历朝历代刻工中未闻有第二人。他先后参与镌刻的《御制耕织图》《无双谱》《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万寿盛典初集》等作品，皆为有清一代木刻版画之名品，今原版初印的全本已很难见到。殊为难得的是，陈洪绶绘、黄子立刻《楚辞图》（大隐堂藏），焦秉贞绘、朱圭刻《御制耕织图》（东壁书屋藏），均与《凌烟阁功臣图》一并展出，有心者可一并欣赏。

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传统木刻版画刚经历过徽派版画带来的“光芒万丈的万历时代”，人们对于版画的审美也至此停滞。山水松柳、屋宇庭

院的细节勾勒，徽派工匠们早已是轻车熟路。他们擅长的是对景色、人物、情节的整体把握；而相较于独立的人物描绘，就难以摆脱徽派特有的戏曲风格，倘若再单独将人物摘出，难免显得细软绵柔、呆板匠气。

刘源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审美下，剑走偏锋，大胆使用硬朗劲道的铁笔勾划，将人物眉间上扬、肩部高耸、收腰提臀，使姿态挺拔桀骜；人物出相则不再为传统侧面45度角所束缚，如高士廉、刘弘基侧面的细节表情描写，又或屈突通、张亮、侯君集仅有面部轮廓的勾绘，而杜如晦、段志玄、刘政会，索性直接以背影展现，这种仅用姿态来表现个性的方法，给观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又如程咬金以泰然自若的文官形象出现、高士廉又似小李广般拈弓搭箭，诸如此类，种种搞怪，可谓见怪不怪，教人臆想无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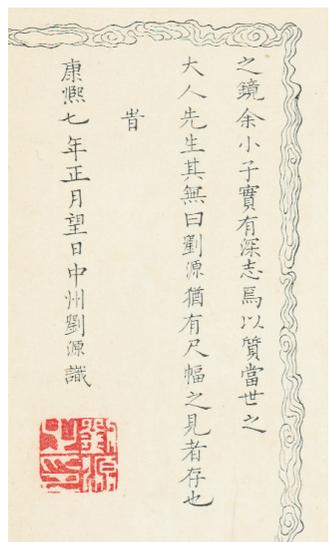
朱圭亦能深领原画神意，线条细密流畅，毫无懈怠，细节亦不忘分毫，一刀一刀镌镂，忠实还原了画作真实韵味；人物版画用墨整体偏淡，且显干涩，明显区别于文字部分，细观衣物外衬线条与内饰花纹、须发分毫与衣冠边角之间，其交汇之处似有二次回纸刷印之痕迹，用墨浓淡有别，使人物面庞、衣襟、铠甲层次分明，颇有立体感。此部《凌烟阁功臣图》在绘、刻、印方面均已登峰造极，硬朗不羁的个性跃然于刀笔之间，不用各种繁杂的背景就可以将人物完全烘托出画面，成功塑造出二十四位性格各异的英雄形象；又将人物传记、图像、诗词、书法等几大元素完美融合，纤微毕现，

惊绝人寰。

后世稀见： 影印出版以化身千百

是书付梓刊成后，可谓工巧绝伦，在当时艺术圈中引起巨大轰动，又或因雕镂过于纤细精湛，木刻雕版无法承受大量印刷的缘故，流传并不广泛，至民国19年（1930），著名藏书家陶湘曾得残本一部，即请人临摹石印，编入《喜咏轩丛书》中；后又得初印本残叶七纸，用珂罗版景印，附于石印本补阙。由此可见，在陶湘时代，原刻初印全本已无从寻觅，多为清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或民国《喜咏轩丛书》本。

今天所见出版物《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中国美术全集·版画卷》《中国古画谱集成》等均有收录。吾师翁连溪先生更将此书于学苑出版社影印，又附民国陶湘之旧藏残本一并出版，化一为千百，与天下爱书人共赏。



余室名“嘉趣籍”，现居北京，原籍温州乐清。学生时期爱练毛笔字，因喜欢古籍版刻字体优美而开始藏书。初时，明、清及民国刻本都有涉及，不弃残本也是我的藏书理念之一。2011年秋后，尽弃民国精刻本、清三代本、殿本、残本，收明刻本，重嘉靖刻本，尤重明末版画刻本。20年买古书的经历，也影响了家人，妻子几年前在国家图书馆培训中心学习古籍修复，如今嘉趣籍有了专职的修复人员。此次，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余将所藏《韩诗外传》十卷送去参展。

“嘉靖三刻”《韩诗外传》得书记

□嘉趣籍 李希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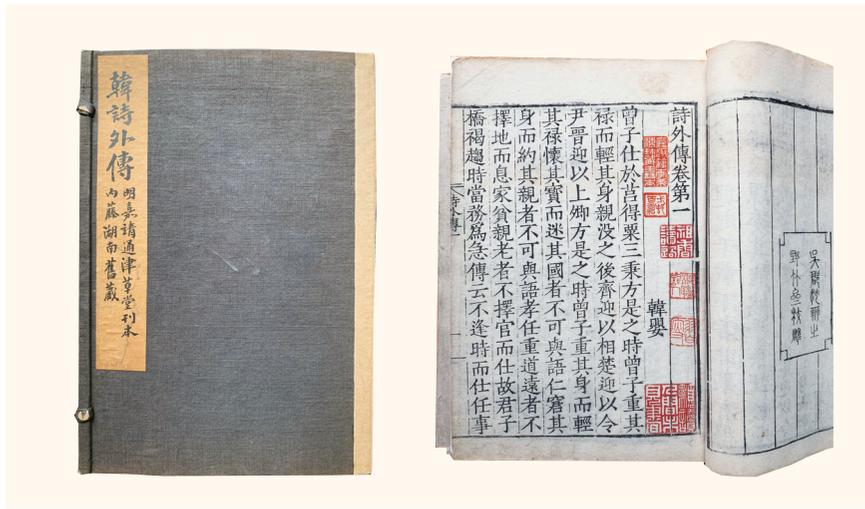
《韩诗外传》，汉韩婴撰，又称《诗外传》，白棉纸，纸墨精良，一函四册，明嘉靖十四年（1535）吴郡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在明代七八种刻本中，此种尤善，亦最为人称道。此本半叶9行，行17字，左右双边，白口，单白鱼尾，版心下镌“通津草堂”四字。

《韩诗外传》之宋刻本没有流传，此嘉靖刻本也由此显得格外珍贵。查《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公藏著录有11家，存量不少，而民间市场流通所见者，近20多年来，国内外仅见这一部。此本1997年从日本东京古礼会流出，为日本已故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旧藏，首页钤一大印，状似乾隆宝玺，朱文四个字“葛鼐藏书”。

葛鼐，明末清初藏书家，字端调，号蹇庵，江南昆山人。崇祯三年（1630）举人，《明代千遗民诗咏》（卷二）中称其好学，藏书三万卷，国变隐居。葛鼐根据家藏古籍，复辑刻印刊行，因刊刻精良，时称“葛版”，然近代以来极少见其旧物传世。

我收藏的《韩诗外传》，有嘉靖三种不同刻本，分别为野竹斋刻本、通津草堂本、楚黄舒良材刻本，称为“嘉靖三刻”。

说到这三种刻本的得书经历，颇为神奇。2012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秋拍的“元雨轩藏珍”专场中，出现了明



嘉靖沈辨之野竹斋刻本《韩诗外传》，此本半叶9行，行17字，左右双边，白口，单白鱼尾，首叶钱惟善序，版心下镌“王良智刻”，钱序末有篆字牌记“吴郡沈辨之野竹斋校雕”。这件经晚清山阴顾寿楨海印楼、近代藏书大家邓邦述群碧楼递藏，收录于《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8万元起拍，45万元落槌。

拍得野竹斋本后，日本好友折水山房主人告知，他藏有此书的通津草堂本。在第二年的泰和嘉成拍卖公司秋拍期间，他特意从日本把书带了过去，我们两人经逐页比对，最终得出结论，通津草堂本的版刻字体，要远优于野竹斋本，

还找出野竹斋本是翻刻通津草堂本的几处文字证据。

时间来到2015年，在嘉德春拍中出现了一部非常稀见的《韩诗外传》，明嘉靖二十年（1541）楚黄舒良材刻本，以楚黄称籍贯乡里，是在湖北黄州府与相邻各县，有些与江西交界，楚黄这个叫法流行于明中叶。此刻本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公藏仅国家图书馆存一部（其中卷三、四为配本），极为罕见。此本半叶9行，行17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黑鱼尾，书末有木记“余读韩诗外传，见其词之古义之邃而本之善也，遂翻刻之，以便教士，岂嘉靖丙午孟秋，

判瑞州府事楚黄广济舒良材谨识”。此书版刻疏朗，字迹端正，纸白墨浓，为明嘉靖一朝版刻精品。初刻初印，保存完整，且为清末民国广东莫伯骥五十万卷楼旧物。这场拍卖，我在美国，只能电话委托参加竞买，从凌晨4点开始，延迟到5点多，24万元起拍，50万元落槌，得书时刻，雀跃狂喜。

自从得到第二种嘉靖本《韩诗外传》以后，我心里就非常渴望能拥有第三种，最后还是折水山房主人高谊，成全了我的梦想，出让了其所藏明嘉靖十四年（1535）吴郡苏献可通津草堂本。那已是7月底，酷热的江南，在吴江的一栋别墅，我接到了这部心仪之物。

屈守元先生是治《韩诗外传》的大家，著有《韩诗外传笺疏》。这本笺疏，我阅读多篇。《韩诗外传》保留了很多古代故事，是书体例为先叙说故事，然后在故事结尾引用一句《诗经》为证。我想选一篇趣味性强的，一直不能得。有意思的是，妻子修复清森阁《何氏语林》时，见其卷四的开头一篇《赵仓唐对魏文侯事》，一句“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解父子沟通难题，好一个精彩的故事，开卷有益了。世上更多事如祁王饮毒遗言，父不知子，子不知父。忽有联想，不知何元朗先生那时候读到的是哪一种宋刻的《韩诗外传》本？

（上接第9版）

第四展厅展示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或者说更早，全国古籍规划领导小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全国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建立之后的保护成果以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所做的努力，对古籍保护工作者如何保护、传承、利用古籍做了一个系统的揭示。此次展览是全国古籍工

作者多年来在古籍保护传承上所做工作的一个缩影，因为成绩太大太多，无法在展览中全部展出，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系统回顾，并着重把古籍保护的成果进行了展示。比如通过古籍普查，新发现的古籍有哪些？展出的就有在西藏发现的元代印刷品佛经、南京图书馆购藏的北宋本《礼部韵略》、福建图书馆收藏的北宋《崇宁藏》的零种……新发现的东西很多，

在展览中有充分展示。

还有我们在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所做的历次重大的古籍修复工程，如赵城金藏、西夏文献、敦煌文献、《永乐大典》的修复，清宫天禄琳琅珍贵藏品及西域文献的修复，云南纳格拉洞藏文佛经的修复，山西藏辽宋金元珍贵卷子装文献的修复，山东宋版《文选》的“蝶变”，等等。“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们修

了330万页古籍，全国古籍修复力量跟十年前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修复室的建立、实验室的建立，等等。在古籍保护上越过了危险状态——传承比较弱，技艺濒临失传，现在是在逐步走向良性循环，当然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人才多、修复力量大这种目标，但是我们迈出了良好的一步。现在除了培训班、传习所和志愿服务外，高等院校也纷纷

建立了科班的古籍保护专业或者专业方向，培养专业硕士、博士这样高学历的人才，所以可以想见未来十年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更好、更良性的人才发展环境。

参观这四个展厅可以看到，从国家宝藏到民间珍本，再到中外交流互鉴，最后到整个古籍保护的成果，实际上内部是有一个联系点的，而这也是展览能产生比较轰动效果的原因。

教攻略：

这是一次很庞大的展览，但也可以用一两句话简单概括——展出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文脉担当和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工作

张志清：此次展览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大，珍贵的藏品也非常多，仅宋版书就将近一百部，大家的反应就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平时只是风闻宋版书如何好，这回是真正见到了宋版，而且

见到了最著名、具有代表性的宋版书。那么怎么把典籍里的文化知识，包括蕴含的思想传播给大众？从整体来说是个长远的工作，关键还是要做好引导性的工作。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秘书长在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有一段讲话，他说图书馆员现在的角色是要当知识的领路人，而不只是知识的守护人，这是一个世界潮流。怎么当好领

路人，引导大家更加深入、广泛地去接触典籍，是一个关键、严峻的课题，不是通过一次展览就能够做好的，但是如果能起到一定的开蒙或引导作用，展览也就达到了目的。

现在展览所伴随的讲座活动、图录编纂出版也都在紧张进行中，就是为了把内容充分展示出来。再如展览中声光电的应用、互动，在展厅中的“寻宝”环节，都

是在引导读者接触古籍、了解古籍，懂得古籍知识。我们马上就要开展关于整个展览的系统介绍，预计一个星期至少有一次讲座，要反反复复、概括性地面向公众讲解展览，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展厅里边的展品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讲座、沙龙、报道、宣传、影视甚至通过新媒体来进行揭示是非常关键的，媒体的前端作用我们充分信任，也希望能够把宣

传工作做到位，持续不断扩大展览的影响。

目前已经举办的讲座有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讲《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国史”是怎样炼成的》，非常受欢迎，今后还会有比较密集的相关讲座。此外，我们还准备派人到全国各地做演讲、开讲座，或举办沙龙，以充分宣传此次大展，让全国人民有机会了解并欣赏到珍贵的古籍。